

# 北大歌谣征集运动的回顾与反思

葛恒刚\*

〔摘要〕 1918年兴起的北大歌谣征集运动,是在五四启蒙运动的背景下发生的,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认识价值。论文以《歌谣》周刊为主要依据,结合其他文献,对歌谣征集运动的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依据歌谣征集运动演变的特征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对每个阶段中相关采集、整理与研究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评估了歌谣征集运动取得的成绩,反思了其足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 歌谣征集运动;歌谣研究会;《歌谣》周刊;反思

1918年兴起的北大歌谣征集运动,是在五四启蒙运动的背景下发生的,与西方人文思潮的涌入、中国民俗学、方言学乃至现代学术机构的兴起,都有着比较重要的关联,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认识价值。近年来,学术界对这次席卷全国的歌谣采集运动虽时有关注,有一些相关成果,但一直未见系统的考察和论述,在不少问题上还缺乏细致深入的梳理和论证。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学术界对这次歌谣采集运动的过程还缺乏清晰的把握,对采集的成果还不甚清楚,对采集的成就估计不足,对采集运动的得失亦未能很好地总结。本文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以《歌谣》周刊为主要考察对象,结合其他文献,对北大歌谣征集运动的过程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梳理,勾勒了歌谣征集运动从萌生到落幕的四个阶段,并对每一阶段的采集、整理与研究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述。在此基础上,对征集过程进行了深入反思,总结了歌谣征集运动的经验和教训。

## 一、北大歌谣征集运动的兴起

从1918年2月至1920年12月,是北大歌谣采集运动萌生期,可谓歌谣采集运动的第一阶段。北大歌谣采集与整理运动的兴起,学界一般认为起源于刘半农和沈尹默之间一次偶然的谈话:

这已是九年以前的事了。那天,正是大雪之后,我与尹默在北河沿闲走着,我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我将章程拟好,蔡先生看了一看,随即

---

\*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210097。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民国歌谣整理与研究及电子文献库建设”(15ZDB078)阶段成果。

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就从此开场了。<sup>①</sup>

刘半农、沈尹默征集歌谣的倡议很快就得到了蔡元培的积极支持,19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一则《校长启事》:

本校拟征集全国近世歌谣,除将简章登载日刊,敬请诸君帮助搜集材料。所有内地报馆学会及杂志社等,亦祈各就所知,将其名目地址函交法科刘复君,以便邮寄简章,请其登载。此颂公绥。<sup>②</sup>

藉此启事,歌谣征集运动的几位领导者向北大全校师生、全国报刊杂志、学术团体发出了征集歌谣的号召。在同一天日的刊上,还刊发了由刘半农拟定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号召“本校教员学生,各就见闻所及自行搜集”,“嘱托各省官厅转嘱各县学校、教育团体代为搜集”<sup>③</sup>。随后,“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于1918年2月挂牌成立,由刘半农具体负责征集处事务,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担任编辑,钱玄同、沈兼士负责考订方言,现代启蒙意义上的歌谣征集与整理活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由于得到蔡元培的支持,也因为注意到了现代报刊传媒在征集活动中将会承担的重要作用,征集活动特别重视利用报刊进行宣传工作,同时期的《新青年》《东方杂志》《太平洋》等报刊皆转载《北京大学征集近世歌谣简章》,在社会上激起了很好的效应。据1918年5月20日的《北京大学日刊》消息,征集歌谣简章发布之后的三个月内,共收到校内外来稿80余起,歌谣1100余首。相比周作人在绍兴发起的,一年之内只有一次来稿的征集活动,成绩还是明显的。为了扩大采集活动的影响,歌谣征集处对收集起来的歌谣,由刘半农甄选、整理并加以评注,命名曰《歌谣选》,从1918年5月22日始,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开辟“歌谣选”专栏,进行连载,每天发表一首,一直到1919年5月22日止,前后大约持续一年的时间,共计发表四川、江西、安徽、黑龙江、广东、湖北、江苏、直隶北平、河南、陕西等地的歌谣148首。这种良好的势头在持续了两年左右之后,发生了变化,北大内部歌谣征集活动因故停滞下来。先是因为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接着征集活动的主要负责人刘半农于1920年赴法国留学,而接棒刘半农的周作人,因为身体不好,病了一年多的时间,“歌谣征集处”无人董理,征集活动遂处于冷却的状态。据《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2月14日的《发起歌谣研究会征求会员启事》一文中所言,“本校征集歌谣,到今已经三年了。所有征集稿件的成绩,一总不过一千七百余首,有几省份还一首没有。”从1918年2月至1920年12月,近三年的时间才征集1700多首,除去开始三个月的1100多首,其他两年多的时间才搜集600首左右,可见歌谣征集活动在五四运动以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离征集活动起初设定的目标差距很大。并且,搜集的范围还很局限,新疆、黑龙江、吉林等几个省域居然一首都没有收集到。这种所谓“高开低走”的状况说明,北大的歌谣采集活动在方式方法上还存在问题。如果延续这样的状况,肯定完不成当初定下的目标。相比于校外已经形成的搜集歌谣的浓厚氛围,原本处于歌谣采集运动核心地位的歌谣征集处,实际上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

## 二、北大歌谣采集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1920年12月至1923年12月,北大歌谣采集运动迎来了第一次高潮,这是歌谣采集运动的第二阶段。歌谣征集活动在北大内部陷入停滞状态时,社会上却因北大征集活动的影响,逐渐形成了采集、整理和研究歌谣的浓厚风气。《文学旬刊》《东方月刊》《妇女杂志》《北京晨报》《学艺》《努力》《少年》《新生活》《民众周刊》等报刊都刊发了各地采集的歌谣以及研究歌谣的论文。其中《北京晨报》

①《语丝》,1927年第127期,原题名《海外民歌序》。

②《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1日,第1版。

③《纪事·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1日,第1—2版。

《妇女杂志》开辟专栏刊发和歌谣相关的文章,校内外歌谣采集活动冷热的对比,让热心于歌谣征集活动的北大法语系学生常惠很是着急。此时,伴随着西方思潮的兴起,中国国内各种学术团体方兴未艾,在学术研究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鉴于此,常惠写信给国文系教授会,建议在北大设立歌谣研究会,以推动歌谣的采集研究工作。他的热心之举,激起了歌谣征集处负责人沈兼士、钱玄同和周作人的注意,他们经过商量,决定成立“歌谣研究会”。在沈兼士、周作人和钱玄同等主事者看来,成立研究会应该是增加人手、集聚搜集力量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1920年12月14日,由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联合署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发了《发起歌谣研究会征求会员启事》:

本校征集歌谣,到今已经三年了。所有征集稿件的成绩,一总不过一千七百余首,有几省份还一首没有。但是期限已到,明年本校纪念日的时候,汇编应该出版了。我们现在仍欢迎投稿,但一面也想筹备编辑的办法。适值得到常维钧先生的来信,所以我们便决定发起一个歌谣研究会,请同学中有研究歌谣的兴味者自由加入,共谋进行。校外有热心的人,也可以由会员介绍入会。详细的办法要等第一次开会时共同讨论……<sup>①</sup>

1920年12月19日,歌谣研究会在北大正式成立。这是一个正规化的学术团体,原本想借助会员群体的力量扩大歌谣征集运动的声势。但是,却因经费支绌,再加上周作人健康不佳,以致这个团体在成立后的两年间,几乎没有什么活动。<sup>②</sup>因此,随着北大学术机构的变迁,1922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后,根据整体的需要,歌谣研究会并入国学门,成为国学门属下的一个分支学术机构,由周作人主持工作。歌谣研究会并入国学门后,有感于歌谣征集运动成绩暗淡,经过开会讨论,再行变革措施,决定发行《歌谣》周刊,办刊的宗旨在《歌谣周刊缘起》里有明确的交代:“其命意在于把已经收到的材料,编成一个有系统的报告,以便将来做‘汇编’和‘选录’的长编。一方面亦可藉此引起社会的注意,和投稿者的兴趣。”歌谣征集处刚成立时制定的,在北大建校25周年校庆时出版“汇编”、“选录”的目标已经破产,这种尴尬的处境,周作人在《歌谣发刊词》里,向读者作了解释和说明。希望采集工作能“补救于将来”,更希望《歌谣》周刊的创办,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得到大家的帮助。显然,发行《歌谣》周刊的原因,是基于五年来对歌谣采集经验教训的总结,发行刊物就是为了能及时刊发采集的成果,和采集者、读者作更多的交流,扩大歌谣采集运动的魅力和影响,激发搜集者的兴趣。因可以说,1922年12月17日《歌谣》周刊第1号的发行,标志着歌谣采集活动进入了新阶段。

《歌谣》周刊每周发行一期,每期8个版面。起初时的内容除了刊发“歌谣选录”、“歌谣集录”、“儿歌选录”、“民歌选录”、“民谣选录”等采集到的经过整理的作品外,还刊发研究的文章、编者和采集者的通信和讨论、国外研究的论文、歌谣集的序言,有时也转载其他刊物关于歌谣研究的论文,并且及时登载收到各地采集者投稿的情况,如“三月五日,收到刘亚民江苏萧县歌谣四则”、“三月六日,收到杨中伟京兆武清歌谣八则”<sup>③</sup>等,内容较为丰富,刊载的容量是附属于《北大日刊》时期无法相比的,这极大地扩大了编者、采集者、读者交流的平台和空间,增强了歌谣采集运动的影响力,很快就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据《歌谣》周刊发布的统计情况,从1922年12月至1923年6月,计收到歌谣的数量是:京兆222首、直隶1236首、奉天44首、山东325首、河南276首、山西139首、江苏1074首、安徽106首、江西32首、福建30首、浙江168首、湖北21首、湖南197首、陕西12首、甘肃10首、四川142首、广东117首、云南216首、贵州23首、广西141首、总计3569首。半年时间采集的数量是前五年采集的数量的两倍,藉此可见《歌谣》周刊的征集效应确实非同一般。其中直隶和江苏情况相当,都超过1000首,排名前两位。山东325首排名第三,列四、五、六位的是河南、京兆和云南,都在200首以上。排在

①《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2月15日,第1版。

②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0页。

③《歌谣》,1923年3月11日,第9号,第8版。

末位的是甘肃,只有10首。黑龙江、吉林、新疆、热河则无人收集。造成歌谣搜集数量地域差别的原因,主要和搜集者的构成有关。此时的采集者主要是北大的学生以及他们的朋友。在北大的学生,除了直隶,就是江苏为多,所以采集的歌谣以直隶、江苏最突出,新疆、黑龙江、吉林除了人员情况,还因为距离较远,交通不太方便,传播难度较大。只有热河的情况特殊,令人费解,应该是该省没有人员参与歌谣搜集活动。受到征集运动成绩的鼓舞,《歌谣》周刊又分别在1923年9月30日第26号、10月21日第29号两次刊登《本会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希望再扩大歌谣征集活动的影响。自此以后的一段时间,各地的歌谣源源不断地寄来,经整理后不断在《歌谣》周刊上发表,歌谣采集运动逐渐进入高潮。据歌谣研究会对1923年采集工作的总结,一年的时间里,共收到七千首,下半年采集的数量和上半年大致相当,表明采集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高效状态,也标志着北大歌谣征集运动的高潮已经到来。

### 三、北大歌谣征集运动的转型

1924年1月到1925年6月,可认为是歌谣采集运动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歌谣采集内容有重要的变化,是为转型期。早在歌谣采集运动的初期,就有关于歌谣研究的相关论文,对歌谣的分类、歌谣与政治的关系、歌谣的音标、歌谣调查研究的方法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随着采集运动的深入,采集成果的堆积,不少参与者要求采集、整理与研究并举。对此,顾颉刚有不同的意见:

一年来,承投稿诸君的好意给予我们很多材料,但地域尚未普遍,例如直隶、河南等省的歌谣固然多,但贵州、甘肃、福建等省就极少了。黑龙江、新疆等省竟然没有了。若把全国各县做一比较表,就立刻可以见出我们的材料真是贫乏得厉害。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还是在搜集材料上用力,材料聚得多了,自然容易做比较研究的工作了。<sup>①</sup>

作为史学家,顾颉刚对研究文献的收集当然会有比较高的要求。因此,在他看来,其实收集到的民歌数量不够多,还满足不了整理和研究的要求,因此现阶段中心的工作,还是要尽力搜集民歌。但是,也许来自读者的要求和压力比较大,或是歌谣征集处的其他主事者和顾颉刚有不同的看法,在两周后的《歌谣》周刊上,即刊发了《一九二四年应作的事》,对歌谣研究会1923年的工作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同时提出了新一年的工作规划:

我们打算在1924年这一年里,固然搜集材料还是我们头一樁大事,但是整理的方法也要偏重一点,搜集材料固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再提到整理更是难上加难,(如解释方音方言,有音节的注出音节和有意义的注出意义。)况且整理之后,才能提到系统的研究呢。至于一九二四这一年,是要注重在有系统的整理和具体的研究,而我们的企望怎样,是全仗会外诸君的热心帮助和会内同人的切实努力。

提出歌谣的搜集固然是新一年的首要工作,但也要偏重一点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所谓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从后来《歌谣》周刊刊发的文章来看,主要有三类情况:一是专题材料的搜集、整理,从《歌谣》周刊第六十二号开始,每期登出一个征集专题,向社会征集相关研究资料。如“看见她”、“孟姜女”、“娶了媳妇忘了娘”、“腊八粥”、“医事用的歌谣”等。二是选取某一方面的专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如“方言标音专号”、“婚姻专号”、“孟姜女专号”、“看见她”等。其中顾颉刚主持研究的“孟姜女”专号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从《歌谣》周刊第69号开始刊发研究文章,一直到第96号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文章的发表才告结束。三是为了弥补暂时未能形成“汇编”遗憾,对搜集到的地方歌谣集

<sup>①</sup> 《讨论》,《歌谣》,1923年12月23日,第38号,第1版。



进行科学的整理和研究,然后系统有序地在《歌谣》周刊上发表。如顾颉刚的《吴歌甲集》、台静农的《淮南民歌》,经整理后相继在《歌谣》周刊发表。可见从1924年初起,歌谣研究会的工作,进入了搜集与整理研究并重新发展的阶段。

实际上,随着民俗学在国内的兴起,歌谣研究已经被认识到是民俗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歌谣采集运动就逐渐被赋予了民俗学的内容,这个转变可以从北大学术机构的调整中看出端倪。1923年5月24日,北大风俗调查会正式成立,成为和歌谣研究会并列的隶属于国学门的学术研究团体。自此以后,歌谣采集和风俗调查往往交叉在一起,可以说,以风俗调查会的成立为起点,歌谣采集运动就已经酝酿了转型的契机。风俗调查会成立后,对北京附近妙香山、东岳庙、白云观及财神殿的进香风俗先后进行了调查,并请校内外人士帮忙搜集相关风俗物品。风俗调查会的调研活动影响到了歌谣研究会,歌谣研究会对民俗调查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其中主持歌谣研究会工作的周作人很重视歌谣在民俗研究中的作用,曾在《歌谣发刊词》中指出:

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种是学术的,一种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他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sup>①</sup>

因此,1924年1月30日,在歌谣研究会总结学期会务的末次常会上,周作人提出了扩大歌谣收集范围的主张,经过与会专家的讨论,达成共识。<sup>②</sup>在1924年3月2日的《歌谣》周刊上发表了一个启事:

歌谣本是民俗中的一部分,我们要研究他,处处是离不开民俗学的,但是我们现在只管歌谣,旁的一切属于民俗学范围以内的全部抛弃了,不但可惜,而且颇感困难,所以我们先注重在民俗文艺中的两部分:一是散文的,童话、寓言、笑话、英雄故事、地方传说等;二是韵文的:歌谣、唱本、谜语、谚语、歇后语等一律欢迎投稿。再倘有关于民俗学的论文,不拘长短都特别欢迎。

这种搜集范围急剧的扩大,使得《歌谣》周刊逐步成为民俗学研究的阵地,而文学的色彩减淡了。<sup>③</sup>

1924年春季开学后,歌谣采集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歌谣采集的特点是不断扩大采集的范围,民间故事、谚语和歇后语等亦成为征集的内容。从《歌谣》第47号起,开始登载关于民俗、方言研究方面的各种论文,民俗学的色彩显著增强。仅从歌谣来看,各地寄来的稿件虽还是以歌谣为主,但也逐渐增加了谜语、歇后语、谚语之类的稿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歌谣征集的工作大体还处于高效的状态,这从《歌谣》周刊第61号的一个年度的统计数据上能得到证明。从1923年7月到1924年6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总共收到各省歌谣总计为7667首,<sup>④</sup>约是上次半年度统计数据3569首的两倍多一点。从总体上说,采集的速度与过去相比是平稳的。具体到各省的统计情况来看,与之前的采集状况相比,大体也处于相似的状态。直隶以1944首依然高居榜首,江西、福建、贵州、奉天等省搜集的情况还是没有多大起色,都在100首以下。热河、甘肃、新疆、黑龙江依然未见作品。惟云南的搜集出现了很大的改观,总计搜集1795首,仅略少于直隶,高居第二位。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在云南发展了新会员,在新会员的参与后,采集的作品就显著增多了。<sup>⑤</sup>

可能是因为歌谣采集落潮的原因,也因为歌谣研究日趋与民俗学结合的情况,北大国学门决定对下属研究机构进行整合。1925年5月11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开会,决定《歌谣》周刊出版到第96号后停刊,暑假后并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因为稿件太多,在1925年6月28日增刊第97号

①周作人:《歌谣发刊词》,1922年12月17日,第1号,第1版。

②《本会常会并欢迎新会员纪事》,《歌谣》,1924年3月2日,第45号,第4—6版。

③刘半农主持歌谣研究会时,歌谣征集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俗文学的文艺目的,民俗学的色彩不太强烈。

④⑤《歌谣》,1924年6月29日,第61号,第8版。

后才正式停刊。<sup>①</sup>不曾想由于时局变化,国学门的主事者不久就流散各地,歌谣征集不得不停顿下来。歌谣征集运动第三阶段也正式宣告结束。正如胡适在《歌谣复刊词》中所说:“《歌谣》周刊停办,正在上海‘五卅惨案’震荡全国人心的时候。从此以后,北京教育界时时受了时局的的震撼,研究国学门的一班朋友不久也都散在各地了。歌谣的征集也停顿了,《歌谣》周刊一停就是十多年。”<sup>②</sup>

#### 四、北大歌谣征集运动的恢复与落幕

从1935年春至1937年6月,是歌谣采集运动的第四阶段。在经过十年的停歇后,1935年春天,北大文科研究所决定恢复歌谣研究会,聘请周作人、魏建功、罗常培、顾颉刚、常惠、胡适为歌谣研究会会员。研究会于二月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如下决议:一、决定重办《歌谣》周刊。二、编辑新国风丛书,转收各地歌谣专集……四、整理《歌谣》周刊前97期的材料,分类编纂印行。<sup>③</sup>于是,在停刊十多年后,1936年4月4日,《歌谣》周刊在胡适的主持下正式复刊,歌谣征集运动也宣告恢复。可能是有感于歌谣研究日趋民俗化的趋向,声望日隆的胡适在《歌谣复刊词》中指出:

我以为歌谣的搜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sup>④</sup>

这预示着同第三阶段相比,第四阶段的歌谣采集运动将向文学回归。因此,从第二卷第一期开始,从文学角度研究歌谣的论文明显增多了,朱光潜、林庚、梁实秋、李长之、冯沅君等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面专家纷纷加入了《歌谣》周刊的作者队伍,显示了胡适鲜明的偏重文学的办刊风格。除了研究的论文外,对歌谣的整理也是新阶段很重要的工作。在《歌谣》周刊第二卷第一期的复刊号中,公布了“编印新国风丛书计划”,“自二十五年三月起,每年至少出六种定名‘新国风丛书’”,这是相当繁重的整理工作。除此之外,继续在《歌谣》周刊上刊登已经搜集整理过的作品。据统计,在一年时间内,从第二卷一期至四十期,刊发了整理过的歌谣346首、山歌88首、儿歌88首、情歌52首、渔歌3首、民歌13首、采茶歌12首、船歌1首、小调1首,共计638首,平均每期约16首。因此,在《歌谣》周刊复刊后的一年里,歌谣的整理与研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但是歌谣的采集却不尽人意,基本上没有什么进展。因为经过十年的停滞,原先参与歌谣采集运动的人在世事变迁中已不复是当初的情形,《歌谣》周刊容易复刊,但重整歌谣采集的队伍却非易事,因此,各地采集歌谣投稿的情况大不如前。检索《歌谣》周刊可以发现,在复刊后的第二卷中,已经见不到在第一卷、第三卷中经常刊登的收到各地民歌情况的条目,可见在其停刊的约十年中,各地采集歌谣的热潮已逐渐衰歇。《歌谣》周刊虽然复刊了,但投稿数量已大不如前。据魏建功在《歌谣采集十五年的回顾》一文中所说,编辑部的徐芳曾对《歌谣》周刊复刊后一年中收到的歌谣数量进行统计,可是结果未见刊发于《歌谣》周刊,因而具体的数字无从知晓。虽然从《歌谣》周刊复刊后的第三卷起,《歌谣》周刊又开始刊发各地寄来收集歌谣的消息,但数量已非复从前。据笔者统计。从第2期至第13期半个年度的期刊上,刊发的歌谣总计1977首,其中宗丕风一人搜集的塞北歌谣就占941首。<sup>⑤</sup>撇开这个数量,全国其他地方总共才搜集到1036首,其中还包括所谓的谜歌424首,属于纯粹意义上的歌谣才600多首。正如上文所言,这反映出这一阶段的歌谣搜集基本上处于低潮状态,没有什么成绩可言。只是这样成效不佳的搜集状况也未能延续多久。1937年6月26日,在刊出第2卷第13期后,《歌谣》周刊宣布暑假停刊,准备秋季开

①《歌谣》,1925年6月21日,第96号,第1版。

②③④胡适:《歌谣·复刊词》,《歌谣》第2卷,1936年4月4日,第1版。

⑤宗丕风搜集的歌谣都是1934年之前搜集的,原有1500多首,经过整理后还有1000多首。见宗丕风《我整理歌谣的经过》一文,载《歌谣》,1937年4月10日,第3卷第2期,第7—8版。

学后9月4日出版第14期,却因“七七事变”的爆发,再也没有复刊。要言之,这一阶段的歌谣采集运动在恢复了一段时间后,虽然有胡适、常惠等人的努力周旋,期望复振高潮时的情形,但最终敌不过时事的变化,在动乱的时局中再次停顿下来,至此北大歌谣征集运动仓促地落幕了。

## 五、反思与展望

总体来看,从1918年2月萌生,至1936年6月落幕的北大歌谣征集运动迭经起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以歌谣搜集的数量而言,来自于三个时期,一是从1918年2月至1920年12月,这一时期收集的歌谣有1700多首。二是从1922年12月17日《歌谣》创刊,到1925年6月28日第一次停刊,约两年半的时间里,采集的歌谣共计13339首。三是从1936年4月4日《歌谣》周刊复刊,至1937年6月26日再次停刊,其间共计收到歌谣1977首(不计算收到的三本歌谣集与两本民间文学集)。三个阶段先后征集到的歌谣至少有16016首。另外还有三本歌谣集:《四川歌谣》第一集、《安徽民间歌谣》与《漳州歌谣集》上辑,以及两本民间文学集《民间文艺特辑》和《台湾民间文学集》中的歌谣。这个成绩是相当显著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各地歌谣文献采集的重要成果。因此,即使是从文献保存的角度,歌谣征集运动亦可谓成果丰硕,厥功甚伟。歌谣研究会对其中的2600多首,进行了较为科学的整理,发表在《歌谣》周刊上,成为后世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源,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价值。再者,歌谣征集运动的开展,促使社会上形成了歌谣采集的浓厚氛围,自1920年代后,歌谣采集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即使在北大歌谣采集运动消歇之后,社会上歌谣采集的活动也没有中止,歌谣采集的成果层出不穷。因此北大歌谣征集运动导夫先路的先锋作用是应该值得充分肯定的!回顾一百年前开始的这次歌谣采集、整理与研究运动,反思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或许对于当下的歌谣采集、整理与研究工作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先从正面来说,采集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原因,一是在于歌谣运动的领导者刘半农、周作人与胡适等人很好地借助了北京大学这个平台。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大在社会上具有较大的号召力,以北大名义向全社会发出征集歌谣的号召,比较好地激发了社会的力量参与其中,这是歌谣采集运动能取得成绩的重要前提。因为歌谣广泛地分布各地,如果不借助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参与进来,采集就很难具有普遍性,成果自然会大打折扣。周作人1915年在绍兴也曾刊发过征集歌谣的启事,但是一年中只收到一份稿件,原因主要在于绍兴在影响力上无法与北京、北大比肩。周作人到北大工作后,情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变。作为歌谣采集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周作人领导北大歌谣采集运动取得了史无前例的重要成绩。前后出现巨大反差的原因就在于采集平台的不同。二是成立歌谣研究会和创办《歌谣》周刊,这是歌谣采集运动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歌谣研究会的成立,不但使歌谣采集运动有一个稳定的组织领导力量,而且能够快速地发展成员,发动、凝聚各地歌谣采集的力量,整合社会多方面的力量投入到歌谣采集运动中来。特别是《歌谣》周刊的创办,对歌谣采集运动的成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解释。一是借助《歌谣》周刊,采集运动的领导者可以通过阐明歌谣采集运动的宗旨、方法、意义和价值等方面的内容,对社会民众进行广泛的宣传,从而扩大采集运动的影响,号召更多的民众参与其中。二是《歌谣》周刊是展示采集成果的重要平台,对采集到的作品的刊发,有效地激发了广大民众参与到采集运动中来,是扩大采集队伍最好的宣传手段。因此在《歌谣》创刊以后,采集队伍得以迅速地壮大,歌谣的采集数量亦成倍地增长,成效显著。从1922年12月到1924年6月间,在《歌谣》创刊后一年半的时间里,就采集到了一万多首,这个成绩是《歌谣》创刊之前难以比拟的。

当然,采集工作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首先,从采集的绝对数量来看,相比于中国歌谣的总量



来说,一万六千多首(或更多)的采集量在分量上是相对较小的。魏建功在1937年4月3日的《歌谣》周刊第三卷第一期上,曾发文对1918年歌谣征集运动以来的工作进行总结,认为中国歌谣的总量应该至少有八十万首。《歌谣》周刊创刊十五年的过程中,只征集到13339首,只是“九牛一毛”,“实在算不得有什么进步了”<sup>①</sup>。其次,征集运动缺乏有效的采集方法,始终处于无组织的松散状态,个人化、随机性与随意性太强,持续性与稳定性不够。征集运动开始时,曾提出三种采集方法:一、利用官方的力量;二、个人的搜集;三、委托中小学教员向学生搜集。可此后多年的采集实践证明,官方的力量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的借用,这与歌谣研究会缺乏行政权利直接相关,当然也是因为主事者未能积极争取官方支持。而中小学师生因为观念、意识问题,同时也缺乏教育部门的支持,始终没有参与进来,当然也就没什么值得注意的成绩。十五年中,主要还是依靠个人的力量在搜集。而参与搜集的个人也是很少的一些人。魏建功曾指出这种情况:

我们惟一的来源实在是大学同学的兴趣合作,所以投送(歌谣)最多的河北、山东、江苏,乃是当时大学同学人数较多的几省。<sup>②</sup>

个人的采集又往往凭借兴趣在业余时间进行,采集的范围也总是有限的,采集的兴趣能持续多久也不一一,因此歌谣采集很难保持稳定的水平,在采集经过一段时间后,往往很难坚持下去,这大概就是1924年后以《歌谣》周刊为中心的歌谣采集运动落潮的主要原因。再次,歌谣运动的组织者都是用业余时间参与采集工作,往往不能长时间专注于歌谣的采集活动。一般情况下,他们经常只是坐在办公室里,整理他人寄来的稿件,很少走到民众之中,做切实的采集工作,因而也未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还要提及的是,采集成果表现出来的地域不平衡问题特别明显,虽然歌谣运动的领导者们曾在《歌谣》周刊上呼吁解决这个问题,但收效甚微,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其中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歌谣采集运动虽然有歌谣研究会这个组织在领导,但因为学术机构先天的不足,缺乏行政权力和能力,因此歌谣研究会很难组织实施行之有效的采集手段,地域不平衡问题的很难破解就在情理之中。这些采集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今天的歌谣采集、整理与研究工作,无疑是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的。

(责任编辑:高峰)

## Peking University's Campaign of *Ge Yao* Collection: A Retrospection and Reflection

GE Heng-gang

**Abstract:** The campaign to collect *ge yao* 歌谣 (literally ballad) nationwide launched by Peking University in 1918 took place in the wake of May Fourth Movement. This campaig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value in Chinese academic history. Mainly based on the weekly magazine entitled *Ge yao* and other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paper made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the process of *ge yao* collection, which was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The issues concerning the solicit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studies of *ge yao* at each stage also received an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is basis, the achievements made by the campaign were evaluated and the experience, positive or negative, also reviewed.

**Key words:** campaign of *ge yao* collection; society of *ge yao* research; *Ge Yao Weekly*; reflection

①②魏建功:《歌谣采集十五年的回顾》,《歌谣》第3卷第1期,第21—24版。